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10月號刊出的「文化冷戰」學術論文專輯，刊登張楊、許維賢和吳國坤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收到相當不錯的反響，更有讀者親臨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部購買雜誌，對我們的編輯製作團隊無疑是不小的鼓勵。我們歡迎對「文化冷戰」感興趣的學界朋友惠賜新作，希望明年能夠多刊出一次論文專輯。

——編者

戰時鄉村權力變革的另一種解讀

關於戰時中國的普通人及地方秩序重塑，成為愈來愈多學者關注的論題，但往往是基於官方視野而呈現出同質化的論述。張雷〈戰中之戰：抗戰時期江蘇西北鄉紳的抉擇〉（《二十一世紀》2022年8月號）一文卻從地方鄉紳的角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讀和觀點。作者選擇了其家鄉江蘇省豐縣西北三寨為研究區域，其不滿足於西波特（Peter J. Seybolt）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人的既有研究，試圖論述中日戰爭如何破滅該區域自捻亂以來形成的「鄉土互保體系」，而戰時地方鄉紳的選

擇又如何一步步促成了中共革命在蘇北鄉村的發展。

區域抗戰史研究的深入，令學界認識到抗戰時期的中國絕非鐵板一塊，本文作者選擇的「寨圩」模式，則讓讀者注意到淪陷前的蘇北存在着具有政治軍事意義，也是獨立完整生產單位的「保護型經濟」，在這種自衛與自治體系中，國家的影響往往被限制在縣城，原有的地方、國民黨、共產黨三種武裝力量難以觸及鄉村，豐縣的西北三寨對各方勢力都有所接觸卻可置身事外。隨着抗戰爆發，鑒於西北三寨的地理優勢和資源支撐，國民黨試圖拉攏鄉村精英，而地方武裝王獻臣在投日後引發了日偽首次進攻寨圩，在國共的馳援中三寨暫時解圍，並形成日軍、國、共三足鼎立的豐縣武裝態勢。在時局的裹挾中，地方鄉紳不得不重新考量如何自衛與生存，最終選擇倒向國民黨。但這種打破權力平衡的做法很快引來日軍大舉進攻，西北三寨損失慘烈，日軍開始扶持各路親日政權，這不僅導致國民黨在鄉村式微，也使得村寨體系破滅。

與很多研究不同，本文並未止步於討論鄉村權力的表面變革，而繼續考察了戰時鄉紳

的選擇如何進一步影響中共革命的發展。中共在「鄉紳之死」後開始填補地方的權力真空，卻又進一步引發了國共之爭，鄉紳畏懼再次陷入其中，放棄了對寨圩模式的重建，只能退讓而避走他鄉，這使得中共革命在鄉村迅速發展成為可能。

雖然本文主要利用中國大陸和台灣所藏的史料，且主要徵引建構性較強的回憶錄、日記、方志等，未能利用基層所藏檔案文書及日方史料，但卻較為令人信服地勾勒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面相。相比前人研究提出的「中共收服論」，作者通過對豐縣較長時段的考察，從地方鄉紳和寨圩的視野，指出中日戰爭對鄉村權力格局的重塑，而中共也正是抓住「保護型經濟」體系被移除的契機，才能較為順利地嵌入其中，最終形成對鄉村的直接管控。

朱熹 上海

2022.9.3

社會的現象與動機

社會學家韋伯和涂爾幹（Emilé Durkheim）曾不約而同地指出，在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個人內心的想法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同想法所表現出的行為互相碰撞才形成社會現象，而這種社會現象與個人最初的想法往往不相符合。社會現象的這一特性使得解釋歷史事件非常困難，動機經過利害的博弈之後產生現象，但博弈造成的非線性映射使得現象無法被直觀地還原為動機。

對於知青上山下鄉的解釋，一直以來都有不同說法，各執一詞，都有其依據。我們很直觀地認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的個人活動，忽略了社會當中其他的想法和力量造成的影響，以至於試圖將所有的動機都歸納給毛，結果陷入明明已經有合理依據卻無法完美地自圓其說的困境。秦暉〈意識形態？就業困境？過河拆橋？——1968年末知青大潮興起重探〉（《二十一世紀》2022年8月號）給予我們新的啟發，重新觀察這一時期的社會現象，考究哪些是屬於毛本人的動機；繼而驅使我們思考那些不屬於毛的動機又是哪裏來的思想，如何與這一時期的背景和毛的新主張發生碰撞，使得現象最終以我們所知道的形象展現在面前。

雖然文章揭示了我們過去所採用的符合直覺的框架並不符合現實，但是文章本身尚未完全擺脫這種舊框架的影響；在逐一檢視過不同動機之後，重新定義了毛推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多重動機，不過還沒有意識到文章本身揭示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在毛推動上山下鄉的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上山下鄉這一社會現象，並不是以毛的思想為藍本的實踐，而是原有社會現象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的行動在毛的新主張下的反應，或者說上山下鄉這一歷史事件針對這一時期人口流動現象，是在事後所賦予的意義。

隨著我們對這些歷史事件橫向背景的研究愈加充實，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在不同語

境下「上山下鄉」這個詞語所代表的更具體的橫向坐標位置，究竟是指毛的主張、歷史事件被賦予的意義，還是某一時期一些社會現象的代名詞。

許源 香港
2022.10.6

打破對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思維定勢

吳國坤〈冷戰中的文化傳承——張國興與亞洲影業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紀》2022年10月號）試圖超越傳統「文化冷戰」的路數，超越香港電影的「冷戰敘事」，跳脫出以往冷戰電影研究的框架。吳文注意到一個相對較少被關注的研究對象——亞洲影業有限公司，並以此為視角，探索1950年代赴港知識份子、文化冷戰與香港電影不被人熟知的一面。

作者以亞洲影業的第二部作品《楊娥》為例，通過解讀這部反清復明歷史題材武俠片的影片內容、演員陣容、技術投入、票房收入、好萊塢對其評價以及該影片為華語電影帶來的積極影響等層面，分析了亞洲影業電影的多重意識形態內涵，剖析了冷戰氛圍下華語電影及香港電影市場的優勢與局限、以亞洲影業為代表的香港電影網絡與好萊塢的交流與互動，以及它們之間的跨國、跨區域電影網絡，並從微觀的角度回顧了亞洲影業的歷史。

吳文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打破了以往對於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思維定勢，即認為由美方暗中資助的香港電影是政治宣傳和灌輸反共信息的直接工具。作者對這一時期的華語電

影和香港電影網絡進行再思考，呈現出香港華語電影靈活發展並超越意識形態桎梏的樣態，其筆下的影片主題更多呈現出民族主義、自我尊嚴、對傳統倫理的肯定等方面，而不是赤裸裸的反共主題；對於電影的追求也並非局限於政治宣傳，而是有藝術造詣、商業利益以及開拓華語電影新領域的綜合考量，由此闡釋了香港華語電影並非是美國冷戰反共話語體系的被動接受者。相反，亞洲影業的孕育和發展體現的是在香港獨特的地理、政治位置，以及赴港知識份子在政治立場、意識形態、身份意識及文化傳承目標等多重因素的基礎上所作出的主動反應。

不足的是，作者提及亞洲影業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和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祕密援助，卻未深入挖掘這之中的關係與具體過程，如亞洲基金會如何考量亞洲影業並隱秘地扶持其發展？又如何的最後結束了對亞洲影業的資助？當中所透露出的深層原因是甚麼？

作者將張國興本人的文化冷戰思維、反共立場，他對於電影質量、藝術水平的高要求，以及香港電影的市場環境等因素都放置於當時文化冷戰背景之下。張國興既想要抗衡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傳播，與左翼電影公司進行對抗，又想提高電影的藝術質量，也想電影得以大賣。文章以他在三者之間力圖取得平衡卻終於失敗的矛盾心理和困境為透鏡，揭示了這一時期赴港知識份子的文化表達和集體意志。

張靜怡 北京
2022.11.21